

治理、边缘与交融：东汉时期 羌人研究的几个问题

段红云

羌人是历史十分久远的族群，古代中国西部众多的民族都与羌人有一定的源流关系。二十四史中《后汉书》专为羌人立传，即《西羌传》，与东汉时期羌人的发展、汉羌关系成为中国民族关系的重点等历史背景相关。然而《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羌人“出自三苗”记述，受司马迁“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之说的影响，而该传中有关羌为“姜姓之别”的记述，实际上否定了羌源于三苗说。羌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由其所居青藏高原东部地理环境决定。羌人不断向外发展，特别是东、西、南向发展，对中国历史上民族交融发展和民族分布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后汉书·西羌传》 羌人 民族交融 东汉时期

作者段红云，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研究员。地址：昆明市，邮编 650091。

羌人作为拥有悠久历史和厚重文化的古老族群，与今日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诸多民族均有着历史渊源。但正史中有关羌人的系统记录仅见于范曄《后汉书·西羌传》，学界虽对羌人群体研究颇为丰富，但以《后汉书·西羌传》为中心的研究并不多见。^①在对《后汉书·西羌传》进行深入解读的基础上，笔者发现其中有许多关于羌人的历史记述值得进一步讨论。中国古代正史撰写基本上是以政治为中心，范曄站在国家本位立场之上，以羌汉关系为主线，强调东汉王朝对羌人的治理及其矛盾冲突，这部分内容是比较准确的，基本上能够反映历史真实；但对于羌人源流、民族文化的记述则囿于范曄的民族观和个人经历等原因，难免有主观臆断甚至是认识的错误，需要进一步探讨和辨析。

^① “羌”在甲骨文中已经出现，西周以后的文献中频繁出现关于羌人的记载，但在正史中仅有《后汉书》给羌人立传。抗战时期，为了激励国人的爱国热情，振奋中华民族精神，学术界从“大禹生于西羌”切入，开始对西羌进行研究，但民族学色彩较浓，与《后汉书·西羌传》内容关联性不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羌的研究超出以往，顾颉刚在《史林杂识》（中华书局 1962 年版）初编的《秦与西戎》中讨论羌人的分化问题，李绍明在《关于羌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 年第 5 期）中强调古代羌人与现代羌族不能够简单等同。此后代表性的羌人研究专著有马长寿的《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任乃强的《羌族源流探索》（重庆出版社 1984 年版），冉光荣等人的《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年版），何光岳的《氐羌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等。上述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与古代羌人和现代羌族的研究有关，绝大多数集中于对羌族源流的研究，而以《后汉书·西羌传》的文本作为研究对象则少见。

一、汉羌关系与《后汉书·西羌传》的文本书写

商周时期,绝大部分羌人在空间分布上还没有与华夏族直接相连,羌人与华夏族之间还有一个戎,但已经和华夏族有密切的政治关系,《尚书·牧誓》中即有“及庸、蜀、羌、鬃、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之语,^①这就说明武王伐纣时羌人的军队就参加了牧野之战。

汉代,羌人的分布区已经直接与汉族的分布区相连,《后汉书·西羌传》载:“至于汉兴,匈奴冒顿兵强,破东胡,走月氏,威震百蛮,臣服诸羌。景帝时,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②可见,随着西汉王朝治理的深入和边疆民族势力的消长,部分羌人开始迁入汉族分布区,与汉族杂处,汉羌之间因此在生产生活资料的分配与占有方面发生了矛盾冲突。《后汉书·西羌传》载:

至宣帝时,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视行诸羌,其先零种豪言:“愿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安国以事奏闻,后将军赵充国以为不可听。后因缘前言,遂度湟水,郡县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与诸羌大共盟誓,将欲寇边。帝闻,复使安国将兵观之。安国至,召先零豪四十余人斩之,因放兵击其种,斩首千余级。于是诸羌怨怒,遂寇金城。乃遣赵充国与诸将兵六万人击破平之。^③

汉羌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因为羌人希望到“不田处以为畜牧”所引发的。而赵充国对于羌人的弹压,使得矛盾进一步激化,但同时也遏制了羌人东进的脚步。

东汉王朝建立后,羌人不断攻击凉州刺史部各郡,“穀马扬埃,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④由于凉州刺史部自东向西分别是北地郡、安定郡、武威郡、汉阳郡、金城郡、陇西郡、武都郡,与东汉王朝的政治中心司隶校尉部(即王畿地区,一般也称为“三辅”地区^⑤)紧紧相连,因此羌人的攻击导致王畿地区动荡不安,时常威胁着东汉王朝的统治。在此期间,东汉王朝为应对与羌人的冲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朝廷的军队“驰骋东西,奔救首尾,摇动数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资”,而边境居民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纆而为虏,发冢露骸,死生涂炭”。^⑥安帝、顺帝时期,东汉王朝为了平定凉州刺史部各郡羌人的反抗,20余年间,花费了当时的320亿钱。^⑦其耗费的社会财富之巨,由此可见一斑。为处理好与羌人的关系,东汉特别在这个地区设置了护羌校尉,但由于所任将领不能很好处理与羌人的关系,护羌校尉之职亦频繁选任他者。此外,朝廷也一直没有一套稳定的处理汉羌关系的民族政策,导致如果担任护羌校尉的将领对羌人问题处理恰当,则矛盾相对缓和;反之,羌人的反抗就十分激烈而且持久。以至于到了东汉晚期,董卓就曾经利用羌人的武装力量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东汉晚期羌人在西北地区与朝廷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是东汉灭亡的历史原因之一。

① 《尚书正义》卷12《周书·牧誓》,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3页。

② 《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76页。

③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77页。

④⑤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900页。

⑥ 三辅,又称“三秦”,本指西汉武帝至东汉末年(前104—220年)期间,治理长安京畿地区的三位官员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同时指这三位官员管辖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三个地方。隋唐以后称“辅”。

⑦ 《后汉书》卷65《皇甫张段传》:“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第2148页)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一直是在不断变化的,随着各民族势力的此消彼长,以及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调适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不断整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关系和民族矛盾会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和阶段性特征。秦汉时期,匈奴侵强,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最大的威胁和隐患,直到东汉初年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才结束了汉匈之间大规模的矛盾冲突。然而,随着匈奴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羌人诸部与东汉王朝的矛盾冲突,汉羌关系成为东汉时期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主要方面。对此,范曄在《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中说:“四夷之暴,其势互强矣。匈奴炽于隆汉,西羌猛于中兴。”^①当然,东汉时期凉州刺史部羌人诸部的反抗与西汉时期北方匈奴相比较是有差别的。一方面,西汉时期的汉匈民族矛盾是西汉政权和匈奴政权的博弈,而东汉时期汉羌民族矛盾则是东汉王朝与凉州刺史部羌人诸部之间的矛盾,羌人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与东汉博弈;另一方面,羌人的反抗没有像匈奴对西汉王朝的攻击那样涉及整个西汉王朝的北部边疆,羌人的反抗是局部性的,对东汉王朝的威胁也不像西汉时期匈奴那么大。

从多民族中国的发展历史来看,不同时期民族矛盾的空间、对象和内容都在发生变化,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会有一些具有强大实力的民族存在,这些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影响着多民族中国发展的历史走向。西汉时期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汉匈关系,因此在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当中有十分详细的《匈奴列传》;但到了东汉时期,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关系发生了变化,汉羌民族关系成为多民族中国民族关系的重点,所以在范曄《后汉书》中才会有《西羌传》,同时也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西羌传》,对羌人给予重点关注。两汉时期民族关系的差异反映了多民族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一种趋势,《后汉书·西羌传》就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

二、《后汉书·西羌传》文本反思——从羌人源流说起

据《后汉书·西羌传》载,居于华夏族西方的羌人与南方的三苗有源流关系,其文曰:

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②

《后汉书·西羌传》这段话第一次对羌人的民族源流、起源之地、迁徙原因、分布区域等进行记述。但其中关于羌人与南方的三苗有源流关系的记述是值得怀疑的,有必要进行讨论和辨析。

范曄认为羌人与三苗有渊源关系,显然是承袭秦汉以来史官对于西戎的认识。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中说“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③而早于范曄《后汉书》的袁宏《后汉纪》中同样称“羌之先,三苗之裔也”。^④发轫于司马迁、止于范曄的三种有关羌人源流的记载,并无太大差异,即舜帝时三苗作乱,后由江淮、荆州之地迁徙至“三危”,成为“西戎”。

《后汉书》中又提及其迁徙路线及居地问题,认为羌人的起源地在南方,说“其国近南岳”。章怀太子注中说这个“南岳”就是“衡山”。也就是说,范曄认为羌人的起源地是在南方靠近衡

① 《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传》,第2994页。

②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69页。

③ 《史记》卷1《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页。

④ 《后汉纪》卷9《孝明皇帝纪上》,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4页。

山的地区。范晔这个观点的前提是羌人与三苗有源流关系,即认同司马迁所谓的“迁三苗于三危”,所以才错误地认为羌人的起源地是南方。为了证实司马迁的说法,又添加了更多内容,将“其国近南岳”嵌入文中。按照司马迁的说法,三苗主要分布在江淮地区,所以《史记·五帝本纪》中提到“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正义引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张守节又按:“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①即三苗的主体主要分布在今天的华中地区。《逸周书·职方解》称:“正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薮曰云梦,其川江汉,其浸颖湛,其利丹银齿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②

《后汉书·西羌传》说羌人的分布区为“河关之西南”。这里的“河关”是东汉凉州刺史部陇西郡的一个县,地处东汉的西部边疆,这说明羌人一直到秦代都没有纳入多民族国家的郡县治理体系之中,处于相对独立发展的状态。我们认为这与羌人分布的地理环境有关,因为他们分布在海拔高、气温低的青藏高原阿尼玛卿山和巴颜喀拉山之间的黄河源头。在秦汉时期黄河源头称为“赐支”,《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这里的“河首”就是黄河源头,“赐支”在《尚书·禹贡》称为析支,从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凉州刺史部例图来看,黄河到了河关县以下才开始称为“河水”,而在河关县以上的黄河则分为两个部分,黄河源头称为“赐支河首”,快要进入河关县时称为“赐支河曲”,^③因此羌人的分布区是十分广大的,如果用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是四川以北、陕西和甘肃以西、青海的绝大部分地区,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从羌人的分布区还可以去往西域,所以《后汉书·西羌传》载西羌“南接蜀、汉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④

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羌人的分布区是在青藏高原东部,地理环境恶劣,海拔高、气温低、氧量低,所有这些都与古代典籍所述三苗分布的地理环境差异巨大。从生计方式的角度来看,分布在江淮、荆州地区的三苗是农耕民族;而羌人是个以畜牧为主要生计来源的民族,在《后汉书·西羌传》当中多次提到羌人饲养的牛羊经常是数以万计的。因此,从生计方式看羌人与三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族群,两者之间不存在民族源流关系。

此外,《后汉书·西羌传》又提示说羌人是“姜姓之别”,即羌人是从华夏族先民姜姓当中分化出来的,姜姓源出神农氏。《说文解字》中是这样解释姜姓的来源的:“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从女羊声。”段玉裁注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⑤从这段解释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流行的华夷共祖观,即许多民族与华夏族具有一个共同的人文祖先。羌人与华夏族共同拥有神农氏这个人文祖先,都是神农氏的后代;而三苗的人文初祖在古史传说中则是蚩尤。这种将羌人归于炎黄系统,而三苗归于蚩尤系统的文化源流观,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二者并不相关。

那么历史上三苗是否真的迁徙于西北地区?《尚书·吕刑》载:“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⑥《尚书·舜典》又载:“(舜)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

① 《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28—29页。

② 《逸周书》卷8《职方解》,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③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57—58页。

④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69页。

⑤ (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⑥ 《尚书正义》卷3《周书·吕刑》,第247页。

咸服。”^①对于这些事件,《史记·五帝本纪》整理为:“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②这几种文献都认为三苗有强大势力,能够与尧舜进行对抗,所以被舜强行迁徙到西北地区,改变了西北地区的民族结构,即“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如果三苗真的被强行迁徙到了三危,那么三危在什么地方?《后汉书·西羌传》注云:“三危,山,在今沙洲敦煌县东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③据相关研究整理,三危所在地古今有十余种观点,包括魏晋杜预的瓜州(敦煌)说;南朝宋范晔的河关之西南羌地说;东汉郑玄的鸟鼠山西说;伪孔传的西裔说;北魏郦道元的敦煌三危山说;陆德明今甘肃天水说;侯丕勋近甘肃灵台说;唐樊绰罗些城说(今云南丽江);清代胡渭云龙州说(今云南云龙县);清康熙皇帝和近人任乃强的康、卫、藏说;姜亮夫、李文实的青、甘、川、藏、滇及萨尔温江流域说;杨建新伏牛山、大巴山一带说;马少侨的洞庭彭蠡周围高山说;清代毕沅,今人段渝、饶宗颐今四川境内(川西高原岷山一带)说等。^④则三危所处虽有较大差异,但以三危之地在西北的观点居多。如果三危之地就在西北,三苗的故乡无疑距此十分遥远,故有学者研究认为:“要把三苗从今河南南部靠近湖北的中原活动区域强行迁徙到极其遥远、极其蛮荒且路途极为艰险的西方显然是非常不合情理的……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在这个地区发现任何上古三苗留下的遗迹。从未有人宣称自己是三苗或来源于三苗,从未发现任何有关三苗的传说,从未发现任何与三苗相关的民俗,从未有明确为三苗文化的考古发现。”^⑤即便真有少量三苗被迫迁入西北,也只能是融入羌人之中,二者之间是一种包含关系。

纵观上述,我们认为《后汉书·西羌传》关于羌人的民族源流和分布的记载是有矛盾的,甚至是有误的。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范晔对西羌的源流、分布等的描述是在《尚书·吕刑》《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后汉纪》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因袭而来的,说明当时范晔没有对中国历史上这些经典著作的内容进行必要的辨析,所以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的争议。当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各民族先民有着多元的起源,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华夏族居中原内地,戎狄蛮夷在边缘地区的分布格局,且“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⑥不同的民族存在较大的文化差异,由于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各民族的统治有个逐渐深入的过程,因此对边疆各民族的认知和了解也存在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这也导致《史记》《汉书》《后汉书》等经典史籍在对边疆民族的叙事文本中呈现出由浅描向深描演进的特征,甚至在早期的记述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讹误之处。

三、羌人文化与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人类文化的产生和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级阶段,地理环境对人类生产生计类型和以此构建起来的民族文

① 《尚书正义》卷3《虞书·舜典》,第128页。

② 《史记》卷1《五帝本纪》,第28页。

③ 《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69页。

④ 参见陈爱峰、杨梅、于晓冬:《〈尚书〉“三危”地望研究述评》,《青海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

⑤ 罗骥:《〈舜典〉三危考》,《思想战线》2016年第4期。

⑥ 《礼记正义》卷20《王制》,《十三经注疏》上册,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版,第1338页。

化的影响更大。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关于西羌的记载是有侧重的,与民族关系有关的内容主要是记载迁徙进入凉州刺史部北地郡、安定郡、武威郡、汉阳郡、金城郡、陇西郡、武都郡中的羌人诸部,而关于羌人的民族志记述则是针对所有的羌人。

有关羌人所处的地理环境,《后汉书》中说“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① 上文已经提到河湟谷地并非不能从事大规模的农业耕作,但羌人选择的生计方式仍是游牧型的,其特点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② 虽然是“所居无常,依随水草”,但是其移动的空间半径不是很大。这里的“所居无常”,并不是根本没有固定居所,应该是属于山地类型的畜牧生计方式,同时在几个地方有相对固定的居住点,而且还有少量的农业,因为文献记载的是“地少五谷”而不是“地无五谷”。因此,东汉时期羌人的生计方式与进入西南横断山的氏羌同类羌、昆明等民族基本是相似的,即如《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羌、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③ 羌人处于随畜迁徙、所居无常的以畜牧为主,辅之以农耕的发展阶段。

婚姻家庭习俗方面,囿于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加之地理环境的承载力有限,人们不可能形成大规模聚居的聚落,与农业民族相比难以形成以父系为中心的强大政治集团和社会组织,因此羌人的民俗是“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同样是因为地理环境承载力不足的关系,羌人的婚姻也是十分独特的,具体是“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嫂嫂”,这是典型的族内转房婚。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文化习俗与家族财产不外流有关,因为娶一个女人作为一个家族男性的配偶是需要在经济上付出的,当这个女人的丈夫去世之后,在家族内部转房,作为家族资源的女人就仍然还属于这个家族,家族内部没有经济上的损失,那些难以找到配偶的男人也就解决了婚配问题,家族繁衍乃至整个民族人口的繁衍都有了基本保证。正是因为如此,羌人社会不论男女到了婚姻年龄都可以找到配偶,因此人口增长很快,史称“故国无�寡,种类繁炽”。^④

由于地理环境的制约,羌人处于“所居无常,依随水草”的生存状态,族众并非定居一地,而是相对定居,再加上高山的阻隔,使各个部落群体之间的联系不是十分方便,这就决定了羌人的社会未能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各个部落群体之上没有一个强大的政治首领,即“不立君臣,无相长一”,羌人内部各个部落群体之间的关系特点是“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在这样政治格局中,各个部落群体都把掠夺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更相抄暴,以力为雄”,^⑤ 所以没有能够控制所有羌人的法律规范。当然,在相互的掠夺过程中,如果杀了人也是要杀人偿命的。以往的研究当中,由于忽视了羌人所处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简单地把他们的社会形态认为是“未开化”的原始社会,这样的观点是有必要进行反思的。

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于羌人的民族性格养成,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后汉书·西羌传》曾载羌人“性坚刚勇猛,得西方金行之气焉”。章怀太子注引《黄帝素问》:“西方者,金之域,砂石之处,其人山居而多风,水土刚强。”^⑥ 生活在恶劣的环境中,使得羌人性格更为刚强,能够在严寒的环境中生存,以至于“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⑦ 同样,由于羌人的民众长期生活在

①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第 2875 页。

② ④ ⑤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第 2869 页。

③ 《史记》卷 116《西南夷列传》,第 2991 页。

⑥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第 2869—2870 页。

⑦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第 2869 页。

高原山区,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各个部落群体为了防止相互的掠夺,同时也为了抵御外族的攻击,都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种亦兵亦民的武装力量特别擅长在山地作战,由于不断发生战斗,所以羌民众的生死观比较特别,“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①

通过对《后汉书·西羌传》关于羌民族志记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生存的重要基础,深刻影响着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文化特质。地理环境的差异,不仅造就了生活在不同地域各民族不同的生计类型,也由此影响到不同地域民族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特质。正因如此,中国各民族群体在发展初期就形成了“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②等不同类型的生计方式和文化特征。同样,受所处地区地形地貌、山川风物、气候生态的影响,羌人形成了“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不立君臣,无相长一”的社会形态及“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的民族性格,并以此为基础,展开了他们文化演进的历程。可以说,《后汉书·西羌传》中对羌人的文化记述,充分说明了地理环境与民族文化的关系。

四、羌人的发展、迁徙与交融

先秦时期,把分布在华夏族西部的各民族都泛称为“西戎”,《诗经·小雅·出车》记载说“赫赫南仲,薄伐西戎”。^③故在先秦时期诸多文献记载的西戎中包含着羌人,但在一些情况下羌人又单独出现在相关的历史文献中。《诗经·商颂·殷武》记载说:“自彼氐羌,莫不敢来享,莫不敢来王,曰商是常。”^④这说明羌人与商有过政治联系。此外,如本文前引《尚书·牧誓》的记载,羌人还曾经参加了周人对商的攻击。由此可见,羌人与华夏族一直都有联系。周人的首领古公亶父还娶羌人之女为妻。《史记·周本纪》有“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的记载,^⑤学术界就有人认为太姜就是羌人,“是羌人第一位嫁给周人的女子,后人称为‘太姜’。……周朝建立后,周王大封诸侯齐、许、申、吕、纪、向、州、郟、厉等都是姜姓的羌人封国,齐、申、吕、纪等国(人)是羌人中最先进入中原地区的,接受华夏族文化最早,也最早同化于华夏族”。^⑥而没有与华夏族融合的羌人则按照自己的历史轨迹继续发展。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早期的羌人处在一种自发的生存状态当中,并无首领,一个偶然的历史机遇,一个叫无弋爰剑的秦国逃犯在秦国人追赶他的时候“藏于岩穴中得免”,^⑦到了“三河”地区。^⑧当地“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也就是说羌人把无弋爰剑作为自己的政治领袖。到了爰剑的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希望恢复秦穆公霸西戎的历史,所以派兵进入渭河上游,消灭了渭河上游的少数民族。这个事件给羌人极大的震动,忍

①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第 2869 页。

② 《礼记正义》卷 20《王制》,第 1338 页。

③ 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30 页。

④ 高亨:《诗经今注》,第 533 页。

⑤ 《史记》卷 4《周本纪》,第 115 页。

⑥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70 页。

⑦ 以下皆见《后汉书》卷 87《西羌传》,第 2875 页。

⑧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注说“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潢河也”,又注引《续汉书》说:“遂俱亡入河潢间。”(中华书局标点本 1965 年版,第 2875 页)按,“三河”应该是今天的河湟地区。

的叔父印畏秦之威,带领属于他管辖的羌人向西迁徙,“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西迁的羌人由此开始分化,“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其中的牦牛种迁徙得最远,进入了西南越嵩郡(今天四川凉山州),又被称为越嵩羌;白马种迁徙进入广汉郡(今天四川绵阳市的大部分地区),又被称为广汉羌;参狼种迁徙进入武都郡(今天甘肃天水市南部),又被称为武都羌。但是,政治领袖忍和他的弟弟舞仍然留在河湟地区,“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① 则河湟地区羌人的兴起,是从忍作为政治领袖的时代开始的,其内部又有众多的部落群体。

忍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研继承了对河湟地区羌人的控制权,这时正是秦孝公雄强的时期,众多的羌人都归属了秦国。在西部所有的民族群体当中,羌研的势力特别强大,“故羌中号其后为研种”。到了战国晚期,由于秦始皇的精力主要是“务并六国,以诸侯为事,兵不西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河湟地区的羌人获得了一次很好的发展机遇,“种人得以繁息”。^②

在《后汉书·西羌传》中,范曄为了照顾到书写内容的完整性,除了以主要篇幅记述河湟地区的羌人与朝廷的矛盾冲突之外,也对河湟地区以外的羌人进行了简要叙述,使我们看到了羌人分化与迁徙的全貌,即到了东汉时期,羌人各个部分的分布以及发展的情况是“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③ 这里的“凡百五十种”可以理解为羌人内部大约一百五十余个支系,也就是说羌人到了东汉时期已经分化为一百五十余个支系,而且这一百五十余个支系已经向不同的地方迁徙。按照范曄的记述,一百五十余个支系的发展与迁徙情况有以下几类:

一是由河湟谷地向东进入关陇地区,并与东汉政权发生了较多战争。原居黄河源头东南、蜀地以北的九个支系居于武都郡,以“参狼羌”为大。以“钟羌”为首的另外八十九个支系,力量比较强大者“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抄盗,盛衰无常”。^④

二是沿黄河向西发展,渐渐与华夏失去交往。《后汉书》中说到有五十二个支系的力量比较弱小,“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这一部分当中所谓“绝灭无后”者,可能是与具有同源关系的其他支系发生了融合;而“引而远去”者,也应该是向西与早已远逃的发羌、唐旄等支系交融,后世史家认为其或为唐代吐蕃的一部分。^⑤

三是向东南进入蜀地内附东汉。建武十三年(38),广汉郡塞外白马羌的首领楼登等人带领五千余户羌人归附朝廷,^⑥对此,东汉光武帝册封楼登为“归义君长”。到了和帝永元六年(94),蜀郡徼外大牦夷种羌的首领造头等人带领种人五十余万人归附朝廷,汉和帝册封造头为“邑君长”,并且赐给了印绶。安帝永初元年(114),蜀郡徼外龙桥羌等六个支系的一万七千二百八十人归附朝廷。次年,蜀郡徼外薄申羌等八个支系的三万六千九百人也归附朝廷。同年冬天,广汉郡塞外参狼羌二千四百人归附朝廷。这说明牦牛羌、白马羌基本上被纳入了东汉的郡县治理体系当中,长期以来,很少与朝廷发生大规模的冲突。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规模比较大的事件是在桓帝建和二年(148),“白马羌千余人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⑦ 牦牛羌、白马羌有可能在西南地区继续发展,并与藏缅语族的相关民族共同形

①②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第 2876 页。

③④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第 2898 页。

⑤ 《资治通鉴》有“发羌,羌之别种,或曰:唐之吐蕃即其后也”。见《资治通鉴·汉记四十》“和帝永元十三年秋”条,中华书局 1956 年版,第 1551 页。

⑥ 如果按每户 5 个人计算,那么也有 25000 人。

⑦ 《后汉书》卷 87《西羌传》,第 2899 页。

成了新的族群。

三类羌人的迁徙、分化，不仅说明其发展速度大大超出了河湟谷地的承载能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不断扩大的东汉政权与周边族群的复杂关系。而羌人群体与东汉之间或征战，或投附，或远遁，也说明了东汉王朝并未有明确的对羌政策，而是相机行事的。

五、结 语

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共生交融，以及少数民族群体分布在边疆地区的基本格局，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何关系，是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之一。王明珂认为，“一个族群或民族可以有共同的‘起源’凝聚，也可以由‘边缘’来凝聚，中国人并不完全依赖内部文化的一致性凝聚，凝聚他们最重要的是来自于‘边缘’的维持”。王明珂讲的“边缘”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就是边疆，多民族中国的各民族就是靠“边缘”或者说边疆来维护大一统中国的不断发展，这样的观点无疑带有积极意义和普适性。但是具体到羌人，王明珂认为传统中国人观念中的“羌”被民族化为“羌人”有三个过程，其第一个过程是“‘羌’为中国人观念中的西方异族与族群边缘，由商到东汉这个族群边缘被华夏的扩张而逐步西移”。^①从《后汉书·西羌传》的记载来看，这样的看法未免有些片面，其一，羌人族群认知边缘西移并不是华夏“扩张”导致的，而是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使疆域发生变化，一些民族群体成为了边疆民族。易言之，我们既要看到华夏政权边界的向西拓展，也要看到羌人活动范围的逐渐东移。当两个边界交汇时，“华夏本位”的历史书写自然会将其认为是天下概念之下的边疆民族。但是若将羌人的自身发展置于华夏边疆拓展的过程之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一过程并非单向的，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其二，羌人也并不是都完全“东移”的，还有诸多的羌人沿河而上以及向东南发展，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融入了华夏及周边其他族群，丰富了各主体的族群内涵，成为中国各民族相互离不开的历史基础。王明珂在《华夏边缘》中提到，东汉时期“陇西与河西的土著都渐渐华夏化了”。^②这诚然是一种羌人进入华夏的历史表征，但我们应该看到关中的饮食当中羌氏文化对于华夏文化的影响。^③在此，我们看到的是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文化的典型案例，以及中国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的交往、交流、交融这一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责任编辑 贾 益〕

① 王明珂：《羌族妇女服饰：一个“民族化”过程的例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1988年。
② 王明珂：《华夏边缘》，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9页。
③ 吕一飞：《〈齐民要术〉记载的羌、胡饮食》，《文献》1993年第5期。